

■ 语言研究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定式的束缚效应

梁晓波, 谭桔玲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4)

摘要: 跨文化交际是当前我国值得重视的问题,而文化定式问题又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定式的产生与认知原型有着不解之缘。定式会引起强烈的自我中心论,导致文化封闭观;引起文化容纳缺失,导致文化吸收弱化;对外族文化以偏概全,引发交际失误和冲突。因此,必须对文化定式拥有正确的意识和认识:要摆脱文化定式的束缚,大胆与世界其他文化交融;要容纳其他文化,重视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要避免文化的冲突,形成文化的和谐相处。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定式; 原型; 意识; 模式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4)01-0124-08

The Binding Effect of Cultural Stereotyp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ANG Xiao-bo & TAN Ju-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4, China)

Abstrac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now emerging 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 in which cultural stereotype is catch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ts existence is inseparable to cognitive prototype. It may give rise to strong sense of ego-centrism, and bring about the view of cultural isolation; it may also give rise to the lack of cultural tolerance, and lead to the deficiency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it may even give rise to the overgeneralization to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cause miscommunication or conflict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t is vital to have a right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to cultural stereotype: the binding of cultural stereotype must be unleashed for the close cultural exchange with foreign cultures; the tolerance to other cultures must be enhanced for the learning of the advantages of foreign cultures; the conflict with foreign cultures must be avoided for an coexistence with foreign cultures in harmony.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ereotype; prototype; awareness; pattern

一 概述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1]7},尤其是当交际双方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使用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其跨文化交际就更具有典型性^{[2]23-24}。生活在同一国度主流文化下的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一般不被看作是跨文化的交流。同一民族生活在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下,其交际一般也不被看作跨文化交际,因为双方文化的根基基本相近,文化认

① 收稿日期: 2013-04-09

作者简介: 梁晓波(1969-),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军事语言等研究。

同感较为趋同,心理距离、情感距离和认知差异度相对小。如果双方长期缺乏联系,加上各自生活环境迥异,受居住地或居住国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其中一方已经融入到异族的主流文化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以及世界观也与居住国其他民族无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就可能产生跨文化的交际^{[3]4}。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世界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交融也更加频繁,跨文化交际也越来越司空见惯。当前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范围也不断扩大。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走出国门,参与国际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能否在世人面前,合理地展示中国人的面貌,传递中国文化,并将海外优秀文化引进到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中外文化的和谐共生和发展,是当前每一个从事跨文化交际的中国人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其中,植根于中西文化各自土壤中的人——也就是跨文化交际的实施者,由于深受各自文化的影响,会因文化定式的缘故对跨文化交际产生重大的影响。

定式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引起了我国语言研究者的注意,当时研究者们更倾向于使用“定型”这一词。较早的研究者以高一虹^{[4]35-36}为代表,她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定型概念的来历以及特点,并用定型的概念阐释了“跨文化交际悖论”,即跨文化交际既传播文化,又会使对方陷入一种简单化标签化的理解。近几年本领域的研究有渐趋热点之势。目前研究已经涉足了民族文化定型的概念、具体表现、语篇与文化定型、言语行为与定型、对外语教学的影响以及有关文化定型的超越与突破问题等^{[5]104 [6]43 [7]136 [8]109 [9]102 [10]41 [11]33 [12]57},但本领域的研究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当前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建设中,有必要提请研究者们更加深入地关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的定式问题。作者将结合认知心理学有关定式的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对跨文化交际中定式的主要作用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对不同文化和语言间的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有所帮助。

二 定式及其认知源头

1. 定式

定式一般看作是思维定式的一种,是社会认知的一个方面,指的是:社会群体成员或多或少呈现出单一性特征的看法^{[13]366}。简而言之,它指的是“僵化、固定的看法”,还可译为“固定成见”、“定型观念”、“刻板印象”等^{[3]204},由美国学者李普曼在《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首先将这个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14]79-103}。他认为,定式应该是“我们头脑中的画面”,“是一种过分简化的意见,具有影响力的态度和部件鉴别的判断”。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较为简化的认知方法,它“把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群人(比如,老人、妇女、穷人或任何民族、种族)塑造成一定的形象,此后,凡是面对属于这个群体的成员,就将之纳入这种预先规定的形象之中”^{[3]204}。与定式相关的其他词还包括思维定式(mindset)、固化模式(entrenchment)、功能固定模式(functional fixation)。前者是个更为一般性的词汇,指的是人们的思维框架,涉及人们在表征问题本身、问题的背景以及解决问题程序方面的既定模式。对于程式化的问题的解决,思维定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两者中,固化模式指的是处理问题中的一般模式,但对于特定问题的处理,它往往不起作用。功能性固定模式指的是一种认知缺陷,即人们往往会因为某一事物的某一特定用途而忽视了其还可用于实现其它功能的作用^{[13]364-66}。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定式、思维定式、固化模式和功能固定模式定义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定式更强调一种看法和观点,思维定式似乎更强调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固化模式和功能固定模式似乎更强调其结果会导致负面的影响。不过这四者之间的共同点也是不言自明的,都体现了稳定的、习惯性的、既定的以及老套僵化的特征。本文认为,定式一词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代表其它 3 个词的内涵,因为它是个更为一般性的词汇。

2. 原型

其实,影响定式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型,我们在本文中有必要搞清楚其与原型的联系,以利于

我们更好地认清定式。有鉴于此,我们先对原型做一简要的讨论。原型是认知心理学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建立的概念,主要贡献者是认知心理学家 Rosch^{[15]382-439}、文化人类学家 Berlin & Kay^{[16]104-110},以及语言学家 Labov^{[17]340-373}[18]67-74。现在原型已是认知语言学中较为基础的概念,指的是某一事物范畴的典型个体或典型特征,也可以是某种抽象的图示。原型也被看作是一种理想化的认知模式,是人们对各类事物的理想化的理解和概念化。原型代表了范畴中所有成员最大化的特征,也集合了相邻范畴中成员最少的共有特征。针对范畴中多个成员而言,原型是他们中间的最佳代表或最佳特征的集合与抽象。当范畴成员只有一个时,那么该成员就会成为该范畴的原型。随着范畴成员的不断增多,原型会不断地被修正,原型的特征也会不断被增补和改进。原型可能因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年代而发生变化。原型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换句话说,同一范畴的典型特征或事物,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因而,从共时的层面来看,同一文化背景下,同一区域或地域概念环境下的人,同一生活阅历或知识背景的人,对某一事物形成的原型基本相同。即便是有差异,差异也应该是微小的。但现实世界要比这个复杂得多。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况是,同一个地方可能生活着来自不同地域、年龄长幼差异明显、有着不同生活阅历、不同知识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夹杂在这其中,人们可能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个人习惯,还可能操不同的语言,经历了不同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锤炼,经受了不同地理气候环境的洗礼和考验。在实际生活中,要探寻同一地区对某一事物概念的原型,有时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图景,对于同一文化、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原型既可能是稳定常态的,也可能是动态变化的,既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元的。值得指出的是,同一文化地区中,由于某类人群可能占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因而他们的思想往往代表了一种主流意识,因而也往往成为原型的主要代表。

3. 定式的认知理据

原型和定式的差别是可循的。原型因为往往是范畴中多个成员比对的结果,因而很可能是多个形式的合成,或最优化的集合或者个体;定式是长期对某一种形式习以为常而将其当作某事物或某事情的唯一理解或做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思考其他形式,不去考虑范畴中其他的成员。因而定式被看作是僵化的思维和理解。举个例子来说明,有关网站的版式可以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的特征典型集合或典型个案可以称为网站版式的原型。由于经常登陆某个网站,我们对其网站版式的接受度会形成习惯,甚至依赖。长此以往,会把它看作版式中的必然选择。一旦其改版,个人会很难习惯。再比如,领导的基本原型是一样的,但每一任领导都有其体现方式,如果周围的群众习惯了他的领导方式,也就成了定式。一旦换领导,群众又得适应新的领导作风,因此,工作定式也要改变了。如此一来,旧的定式也要换成新的定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单位换领导,单位的群众往往难以适应的认知原因。由此看来,定式有点象认知惯性,是人们由于长期的接触和熟悉,习惯性地对某件事情或事物想当然地认为是其必然的代表或表征的结果。说得更直白一些,原型是人们更高层面的理想化的认知和理解,而定式仿佛是对事物的偏态理解,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慢慢地人们有可能将某种正确与不正确的理解与认知习以为常,并以此代表对该事物的最佳理解或看法。好比一些歌曲,刚开始不觉得好听,但听着听着就习惯了,而且也觉得蛮好听的,每当哼歌的时候,该首歌曲还自觉不自觉地就从脑海里展现出来。

然而,这两者又有着深层的联系。原型也可能成为定式。这是因为,人们可能将原型直接当作定式,尤其是在原型是建立在个别范畴成员或范畴成员不多的情形之下。这里我们可以用中国大街上奔跑的小汽车来做一个说明。我国 20 世纪 50~60 年代小汽车的代表应该是当时老式的红旗牌小轿车。这时,人们会将红旗牌轿车作为轿车的定式,也会作为原型。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道路上奔跑的小汽车多为桑塔纳,由此,人们的认知原型和定式也就变换为桑塔纳。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奔跑的小汽车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多个品牌开始出现。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中国小轿车市场得到空前的发展,

大街上奔跑的小轿车名称式样变化多端,不一而足。这时,小轿车的原型概念是一个模糊的典型特征的集合,而小轿车的定式很难有一个稳定的代表,它很可能只有一个区域的代表,很难有全国性的定式。比如,以的士车为例,北京地区可能由于广泛使用现代牌的轿车作为的士的缘故,很可能,人们将现代牌的小轿车锁定为的士,或提到现代牌车就会启动人们的士的定式。同理,在武汉地区,由于广泛使用富康小轿车作为的士,人们对的士启动的第一概念显然是富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原型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概念化,倾向于建立在多个范畴成员之上,而定式,更多地是锁定在个性化的概念上,用个性化的概念来片面地代表全部。也就是说,原型更多地反映的是总体的概念层面,而定式则是原型在不同地区的实现,其实现中体现差别。比如,全球的士的原型大致相同,基本上为公共交通工具的一部分,以四轮为主,客人可以随意搭乘,在抵达目的地后需要缴纳计价器上的费用,且该费用与乘车时间和里程成正比。但不同地区对的士定式并不相同,伦敦地区的士是典型的黑色伦敦老爷车,纽约则是多为黄色的福特牌轿车,上海地区是典型的浅蓝或深蓝的上海大众轿车,而这些地域特色的士会成为当地人们的士定式。

鉴于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原型的概念特征具有一定的超文化性,虽然它也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原型往往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没有一些共有的基础概念,交际双方谈论会找不到共同话题。由于它的通用性,概念的原型效应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是有限的,而真正起较大影响作用的,是文化中的定式效应。即双方都有一定共同的概念基础,但双方对此的具体体现有明显差异,而且都在本文化中固化,又在交际者头脑中形成文化定式。

三 定式对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影响

1. 定式与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作为交际主体的人们在异质文化之间的交际,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必定会造成许多交际的障碍。我们可以预见两种差异:(1)显性差异:主要源于两种文化中可以观察到的明显差异,比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山川地貌、饮食起居、气候水文、语言使用的差异等;(2)隐性差异:主要源于跨文化交际主体的双方,由于长期生活在各自独立而又不相同的文化中,在各自文化长期影响下形成的文化认知效应,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本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方面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认知层面所形成的文化定式。显性差异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人造器物、制度规范、举止行为、风俗习惯、宗教活动等;隐性差异主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等在大脑中久而久之形成的基本定式,以及显性文化在人们大脑中形成的习惯性认知定式。显性差异是客观物质差异,而隐性差异主要是思想观念和态度上面的差异,是建立在认知层面的差异。两种差异都会给交际带来困难,但隐性差异比显性的差异更加难以捉摸,难以把握,因而形成的障碍也更为巨大,更加难以克服。

实际上,在从事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交际的双方不可能将双方的显性差异都一一罗列出来,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展示,实际起作用的仍是交际双方大脑对本方文化的认知和对方文化的认知即自定义和他定式。自定义是对自我的夸大的定式,他定式是对其他文化较为片面的定式认知。每个具体的跨文化交际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双方都有各自的百科知识、文化知识、个人成长经历和个人心理。前3个方面都涉及交际者一直朝夕相处的文化,会对交际者形成深深的烙印,其结果就是文化定式;个人心理尽管不可捉摸,也会体现其民族文化心理定式的一般特征。因此,文化对跨文化交际的执行者会起到重大作用,而深植其中的就是文化定式。这些定式很容易给跨文化交际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当交际者是初次进行跨文化交际或是跨文化交际的初级实践者。

2. 主要负面效应

(1)强烈的自我中心论,导致文化封闭观。当一种文化出现强烈的自我标榜时,就容易产生文化的

自我中心论。它指的是交际者始终以本文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将本文化视为一切文化的最强或最高形式,而其他文化都作为文化的弱者或低级形式,即便是其他文化存在优于本文化的方面,也不予以承认,或是视而不见,盲目地认为该形式并不优于本文化。这样的结果,就是文化的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高自大。中国在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之后,由于这种自我中心论的作祟,就走上了政治上闭关锁国,文化上自我封闭的道路。当时使者带回来的信息是,出访一路所见国家极为弱小和穷困,这助长了当时明朝政府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自我中心论的思想,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化,是世界的中心,没有必要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结果错失了向更好更强盛阶段发展的机遇。清朝入关以后,这种自高自大的自我中心论意识还没有得到有效扭转,一切还是以自己对世界的错误认知来度量世界。因而,直到英国派使者来清朝进行联系时,清王朝依旧以天朝自居,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对待英使者非常傲慢。其实,此时欧洲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已是工业革命之后,综合国力的提升已不可小觑。更有甚者,在英国工业革命近100多年后的1865年,当蒸汽火车被英国人初次引进北京时,慈禧和普通百姓一样,还在抱残守缺,都觉得它是非常恐怖的怪物,很快就下令将其拆除,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文化的长盛不衰。更可笑的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缺乏对外文化的有效交往,当时对“高个子”、“鹰钩鼻”的洋人流传着许多谬论。比如,当时误认为洋人因为腿长,摔倒后会爬不起来。1987年国内曾有部电影《大清炮队》再现了当时人们对英国人的错误认识。故事讲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的初期,在英军侵入大沽口沿海陆地并安营扎寨后,夜晚时分,我方守军摸进了英军的营地,并实施了突袭。袭击的方式是用竹竿将英国守军撂倒在地,大家击掌庆贺,为之欢呼,因为大家都判定英军不能站起来了,而摔在地上的英军是一脸茫然,不知中国人高兴什么,并很快爬起身,组织队伍,使用火枪进行射击。结果,潜入英军营地偷袭的清军官兵大都倒在了枪口之下。抱有如此落后的认识,给自己的队伍带来的结局当然是悲惨的。强烈的自我中心论,源于长期自我定式来衡量其他文化,并自认为自我定式是最佳的形式,由此而自我隔断与世界的联系,清朝的悲剧有多种原因,但疏于尽早对外开放、促进文化交流,是其一个重要原因。总之,缺少对外有效的交流,很容易导致自我中心论,最后就会造就“井底之蛙”,而越是秉持自我中心论,越会进一步恶化对外交流的缺乏,并进一步恶化自身的弱势。

(2) 对其他文化缺乏容纳意识,导致文化吸收弱化。对其他文化缺乏容纳之心,即对其他文化缺乏足够的宽容意识,缺乏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之心,不仅如此,还会产生对其他文化过多的指责,并进而形成如同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所说情况“每个人都是指责异族的快嘴。”^[19]在这种思想的作祟下,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往往被看作低级文化,是二流、三流的文化,因而本方在文化接触和交流中也就不积极、不主动,要么偏执地认为其它文化应该来学习本方文化,要么盲目地对其它的文化的优点视而不见,也缺乏有效的宽容之心,缺乏向其他文化学习的进取之心,缺乏学习其他文化优点与长处的胆量和睿识,没有一种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心态。因此,长期以这样的文化自我定式来行事,其结果就是要么将己方的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将其他文化看作不入流的角色,不屑与其往来。即便是往来,也不在意文化的吸收,或者根本就不从事文化的吸收。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固步自封、自我沉醉、自我损毁、自我限制。短期来说,这样的文化观可能无可厚非,但长此以往,其结果将很可能导致文化的偏执与落后,因为文化一直处在缺乏外来营养的前提下发展,其发展模式很可能会因“营养不良”而过于单一、甚至出现偏狭。由于文化视域受到极大的限制,其发展和成长在局部时间段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但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尤其是与其他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相互交融的文化相比,其最终会成为落伍者,成为文化的弱者,并最终成为历史的弃儿。其发展的另一个结果也很可能是文化的边缘化,与世界主流文化不合拍,不相容,甚至极端落后。在后期与其他文化交往中,又容易形成文化自卑情结,并且进一步恶化文化的容纳之心。因为过于落后,使其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断档,进而形成文化级

差效应,文化变得在世界文明中的分量较弱,在与其他文化交往中找不到自身的身份,其结果是要么继续固步自封,要么彻底改变,彻底抛弃自身文化之根。历史上很多典型的实例是,这些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中,往往会被其他文化边缘化,甚至因抵抗不住文化的冲击而被击败、直至彻底灭亡。历史多次证明,只有注重交往的文化,注重学习的文化,注重竞争的文化,注重发展的文化才能在众多的文化形式中不断发展、不断壮大、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不断超越。古老的印加文化(公元 11~16 世纪),尽管创造了自身的文明,但由于缺乏与其他大洲更为先进的文化的交往,长期处在偏安一隅的发展状态,造成了印加文化与同时代文化的相对落后。当 1532 年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时,印加帝国还没有使用轮式车辆,连最简单的牛马车都没有,还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部族的大事还是以绳节标记或作画来记录,而这时的西班牙已是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显贵,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融,使得当时的西班牙广泛吸收了当时欧亚非等地文化的经典和发展优势^{[20]502-504}。显然,还处在奴隶制农耕文化体制下的印加文化很快就败在了西班牙人的强势文化之下。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受各方条件所限,印加文化无法挣脱当时大西洋和太平洋对他们的限制,因而对域外文化了解较少,也缺少对其他文化的交流,未能更好地推进自身的发展,使得它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中很快处于劣势,直至消失^[21]。玛雅文化也有着相同的命运。在持续兴盛多个世纪以后(前 1800 年至 1524 年),玛雅文化后来偏安在尤卡坦半岛,缺少与更多先进文化交际的条件和可能,在西班牙人入侵后,很快就消失了^[22]。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善于吸收其他文化优秀之处,并致力于发展本族文化的文明,其生命力就必然强盛。长期孤立发展,缺乏对其他文化的容纳之心,不通过交往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不努力推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其结果往往是可悲的。

(3) 对其他文化以偏概全,引发交际失误和冲突。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是经过本方文化洗礼、浸润和锻造的。本方文化基本上已经深深融入到交际者个人的心灵深处,与个人的生活血肉交融、紧密相连。因此,不管交际者愿不愿意,交际者都会受到本方文化定式的约束和限制。这样的交际者因为很少接触其他文化,对其他文化所知甚少,其在实施跨文化交际时,一方面很难跳出本方文化的框架,许多时候都是以本方的定式来确定对拥有异域文化背景的人的话语交际;另一方面,又用道听途说、部分代整体、以偏概全的方式去推断或判断异域文化。不管是在语法层面、语义层面还是语用层面,交际者都是有意识、无意识地在定式的指导下完成交际。也就是说,说话者将主要抱定本方的思维方式、话语模式、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民族心理来实现与对方的沟通,并用本方的有关方面来推定对方的相关方面,心理的主观认知是默认对方与本方的相关方面基本一致,用想当然的心理和态度从事跨文化交际,即便是不默认,也得按照这种定式来操作,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另外,由于对对方文化所知少之又少,因此,对对方的文化只能用老观念,老的思维定式进行交际。这样的结果当然会导致交际失误。实际上,如果交际者按照定式来实施交际,跨文化交际的失误可能发生在很多层面,因为在交际的各个层面的各个环节都会有本族文化的定式。比如,相对于英语来说,汉语基本没有单复数的标记这一语法手段,英语的初学者往往在这个方面会有意无意地犯很多错误,出现大量的交际错误。这样的失误会一直持续到有一天其个人能够打破以汉语单复数模式来构建语言表达的定式,并建立英语的定式,而且能够主动和习惯性地运用。交际的失误还可能发生在语用层面,其结果也可能更为严重。单一的语法失误并不引起交际的绝然失败,只能算小的失误。因为语法属于显性问题,教师一般容易观察到,学生也容易学习到。跨文化层面的语用,是一个隐性意识问题,它要求交际者在实践中能够主动感知并调用对方文化中的语用模式,并以合适的语用方式来从事交际。否则,交际会在一定程度令进行双方不畅快,有时会令人难堪,甚至导致失败,而且双方还很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比如,称呼语的使用是中西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语用问题。由于称呼语在各自语言中都承载着话语语境下的双方关系、礼貌程度以及习惯取向,因此中西方在交际中对称呼语的使用也不同。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时,感受明显的是,在每周一次的例行讨论会上,中国访问学者更喜欢称呼指导教师 George Lakoff 为 Professor

Lakoff, 而美国学生都称其为 George。为此我还问了他本人注意到这种差别没有。他说他更习惯于称他为 George。为此, 笔者在课后又找另一位教授 Eve Sweetser 进行了求证, 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她说在美国西部地区, 大学教授更习惯学生直呼其名, 而不是用“professor”加“surname”(即教授名加姓)。事后, 在同相关的研究生讨论中, 他们也指出, 在同中国人交际中, 他们感觉很难熟练掌握我们的称呼。如果按中国的习惯, 他们有时搞不清楚哪是姓哪是名; 按他们的习惯, 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否能够完全适应和接受。这样, 语用失误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定式的驱使下, 中方交际者会称对方为 Professor George Lakoff, 而美方会受定式的影响, 在不添加姓的情况下直呼中方教授的名字。这样, 双方都感到有些难受, 交际的流畅度也受牵连, 失误也就产生了。与此类似, Scollon & Scollon 在其著作《跨文化交际: 语篇分析法》中介绍文化定式与跨文化交际的章节中, 详细分析了中西方生意往来中, 因文化定式而造成的称呼错位, 并由此引起双方对交际不快的典型事例^[23]122-124。

这样的事例, 有时会因为双方的定式不同, 或一方对对方的文化用本文化定式来进行价值判断, 即建立在他定式的基础之上, 就会形成严重的误解, 甚至造成交际的冲突, 从而严重影响文化之间的正常交往。比如, 据《世界日报》2008年12月15日报道, 因认为腐乳是腐烂的食品,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腐乳进行限制。因临近年底购物旺季, 致使洛杉矶众多华资公司近百个货柜的食品无法及时上架, 事情引发中美双方民间和政界的不愉快^[24]。无独有偶, 2011年6月, 美国 CNN 新闻机构评选出世界十大恶心食品, 其中中国皮蛋(英文 century eggs) 被评为榜首, 此消息一出, 网上一片哗然, 因为皮蛋是中国人长期喜爱的佳肴。很快, 网络上就出现了中国版的海外恶心食品, 西方人喜爱的奶酪也被中国人列为臭烘烘的食品^[25]。由于 CNN 的鲁莽之举, 引发中国大量不满, 除了网民之外, 有关厂家甚至发出了抗议信, 最后 CNN 编辑不得不出来道歉, 并应邀来中国尝皮蛋。其旗下网站 CNNGO 主编安德鲁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了《关于皮蛋的争论》一文, 明确表示“无意冒犯中国文化, 对于无意造成的任何冒犯, 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26]。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时发生, 往往是因为较为极端的以偏概全的文化定式造成的, 但其危害也是明显的, 会造成对陌生文化的误解, 妨碍跨文化交际, 危害跨文化的交流, 对一个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形象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 跨文化交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实践活动,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很大^[27], 深受文化定式的影响。如果缺乏对文化定式的意识和正确认识, 往往会成为自身文化定式的“囚徒”, 对其他文化产生错误的理解; 过多地放大自身文化, 形成强烈的文化自我中心论, 忽视与其他文化的交往, 一是会使本民族文化固步自封, 丧失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融合与交汇的重大机遇, 甚至会给本民族文化带来灭顶之灾; 二是会造成缺乏对其他文化的容纳之心, 忽视其他文化的优点和特色, 不注重对其他文化长处的吸收, 过于注重本方文化的保护, 容易导致形成“夜郎自大”或“井底之蛙”的文化陷阱或悲剧; 三是对对方文化以偏概全, 使得跨文化交际失误和误解频发, 跨文化冲突频现, 甚至造成政治冲突, 所有这些都是跨文化交际中定式潜藏的危害。作为一个跨文化交际的主动者, 应该保持对本方文化的了解, 同时提高文化定式的意识, 适度了解对方文化的相关方面, 提高交际中对双方文化定式的感知能力, 对有些严重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方面要主动把握、主动戒备、主动预警、主动解释、主动提醒、主动化解。尽管我们不能消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定式问题, 但使用积极策略, 消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定式的负面作用, 尤其是以上 3 个方面的影响, 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外语教师来说, 主动使用跨文化交际的教材, 在课程中主动融入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引导学生主动关注现实生活中跨文化交际的重大个案^[28]114, 是提高学生未来从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2]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3] 孙英春.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 高一虹. “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2): 35-42.
- [5] 赵宁, 曲雅静. 民族文化定型的概念及其内涵[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0(1): 104-105.
- [6] 王静.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定型[J]. 江苏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 43-46.
- [7] 陈淑芳. 语篇系统分析法: 文化定式的突破[J]. 求索, 2004(8): 136-138.
- [8] 陈亚明. 文化定型与英语教学[J].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5(8): 109-112.
- [9] 左晓园. 文化定型与归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J]. 宁夏社会科学, 2000(6): 102-103.
- [10] 赵亮. 浅谈社会文化定型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运用[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9): 41-43.
- [11] 宋洪英. 从言语行为看民族文化的定型[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2012(3): 32-37.
- [12] 林碧玲. 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定型与超越[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1(1): 57-60.
- [13] Sternberg R J. Cognitive Psychology[M].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 [14] Lippmann W. Public Opinion[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 1922.
- [15] Rosch E.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6, 8 (July): 382-439.
- [16] Berlin B, Kay P.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17] Labov, W.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C]// In New Ways of Analys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40-373.
- [18] 梁晓波, 李勇忠. 原型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 外语教学, 2006(4): 67-74.
- [19] Samovar L A, Porter R E,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0] Chodorow S, Knox M, Schirokauer C, et al. 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9.
- [21] 百度百科印加文化词条[EB/OL]. (2012-08-10) [2013-09-16].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23.htm>, .
- [22] 百度百科玛雅文化词条[EB/OL]. (2012-08-10) [2013-09-16].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0242/9972305.htm?fromId=40242&from=rdtself>.
- [23] Scollon R, Scollon S W.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4] Eggion. 美国严查中国食品 称腐乳是腐烂的食物[EB/OL]. (2012-08-10) [2013-09-16]. http://www.chineseinla.com/f/page_viewtopic/t_15877.html.
- [25] 肖丹. 皮蛋登上 CNN “最恶心食物”榜首 中国网友反击[EB/OL]. (2012-08-23) [2013-09-16]. <http://news.cnhubei.com/xwhbyw/xwwc/201107/t1761814.shtml>.
- [26] 卢岱. 网友为皮蛋抱不平 国外臭奶酪更加“恶心”[EB/OL]. (2012-08-10) [2013-09-17]. <http://www.21food.cn/html/news/35/639817.htm>.
- [27] 方宁, 陆小鹿. 跨文化交际视域中的语言运用和身份认同——基于文化差异的分析[J]. 外国语文, 2012(2): 85-88.
- [28] 谭桔玲. 论跨文化交流意识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培养[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1(4): 115-116.

(责任校对 王小飞)